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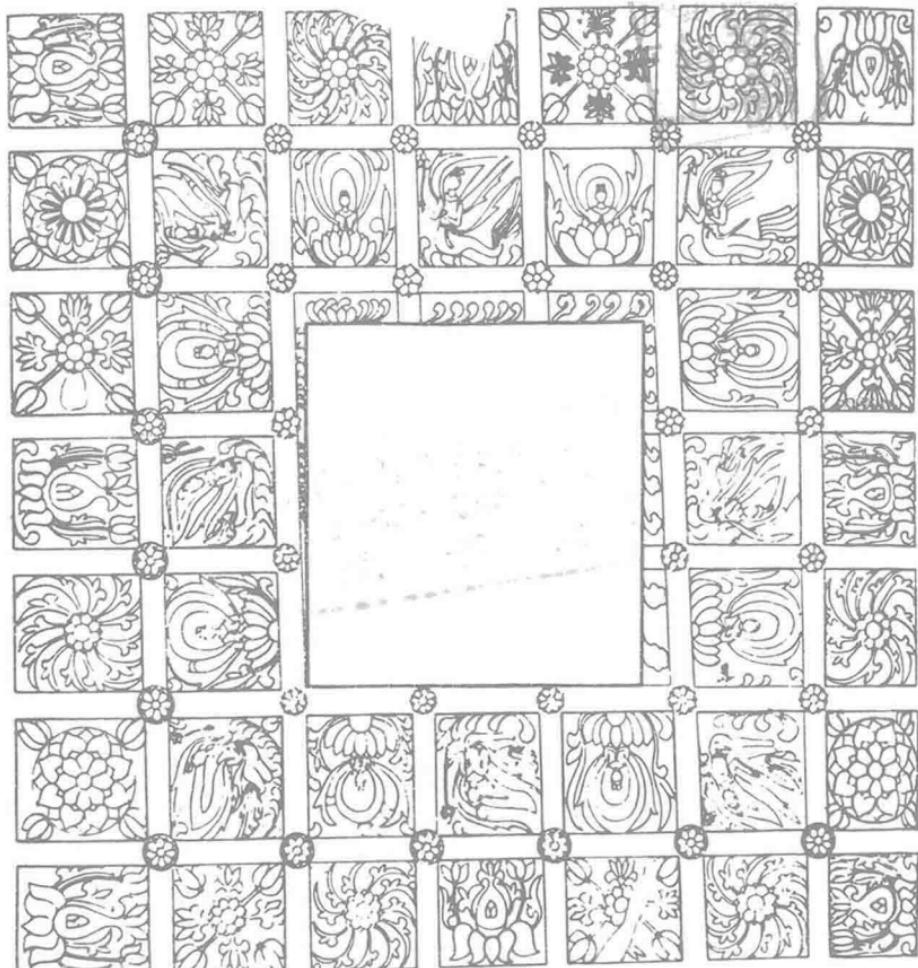
論新化文國中

篇濟經

拓開的生民



拓開的生民



中 國 文 化 新 論 經 濟 篇

民生的開拓 / 劉石吉主編. 劉岱總主編.--臺北市：
聯經；民71 [民78第六次印行]

[7]569面：有圖；21公分.--(中國文化新論一經濟篇)

新臺幣 310元(精裝)
260元(平裝)

I. 劉石吉主編 II. 劉岱總主編 III. 中國文化新論一經濟篇

638.8 / 8744 / V.8

中國文化新論 序

王惕吾

「中國文化是什麼？」這是現在一般人常常提出的一個問題，也是社會上常常討論的一個問題。

無論是倡導文化復興、推行文化建設、促進社會的現代化、或培養下一代中國人的民族文化意識和情操，都與對中國文化全面的認識和了解，有著密切

而重要的關係。

雖然我們生活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中，文化與生命原是不可分的一體，但八千年來先民筚路藍縷，創造傳承而形成的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富麗多采，加以歷代典籍繁多，一般人總難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尤其對於大眾而言，我們更缺乏一部適宜的認識中國文化的現代讀物。

這一部「中國文化新論」叢書就是爲了彌補這項缺憾而編撰。近百位學有專精的年輕學者接受邀聘，分就根源、學術、思想、制度、社會、經濟、

文學、藝術、科技、宗教禮俗等方面，以深入淺出的文筆，客觀系統的探討，呈現中國文化永大永久的內涵，希望能藉此起始，提供一部豐高新穎、流暢可讀的中國文化史叢書。「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可以用來說明這部「中國文化新論」編撰的歷程。

聯合報創刊已屆三十周年，本於「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義，成立了「文化基金會」；「中國文化新論」即由「文化基金會」支助出版，正是為宏揚我國文化、參與文化建設提供的一份貢獻。

〔中國文化新論〕編輯委員會

總主編：劉岱

編輯委員：

杜正勝、林慶彭、林戴爵、邢義田、洪萬生、郭繼生、

黃俊傑、劉石吉、劉增貴、蔡英俊、鄭欽仁、藍吉富。

助理編輯：

方清河、沈松僑。

撰述人：

丁敏、王文進、王孝廉、王明珂、王明蓀、王國良、

朱鴻、江淑玲、何啓民、何湘妃、吳克、吳炎塗、
王霜媚、王鎮華、王耀庭、方清河、石守謙、朱惠良、

吳璧雍、呂正惠、呂興昌、宋淑萍、杜正勝、李今芸、
李弘祺、李孝悌、李東華、李豐楙、周雲錦、林戴爵、
林慶彰、林聰舜、林麗月、邢義田、徐秉渝、孫鐵剛、
高明士、洪安全、洪萬生、洪德先、耿立羣、張火慶、
張永堂、張哲郎、張榮芳、張瑞德、張端穗、曹淑娟、
梁庚堯、莊吉發、郭繼生、陳良佐、陳芳英、陳芳妹、
陳郁夫、陳國棟、陳勝崑、陳弱水、陳慈玉、陳進傳、
陳錦忠、陳擎光、曾昭旭、黃克武、黃沛榮、黃俊傑、
黃寬重、黃耀能、楊宿珍、楊惠南、葛紹歐、魯經邦、
樊亞香、劉石吉、劉君燦、劉良佑、劉昭民、劉紀曜、
劉超驛、劉增貴、蔡明田、蔡政芬、蔡英文、蔡英俊、
蔡學海、鄧淑蘋、鄭欽仁、盧建榮、賴瑛瑛、霍韜晦、
戴晉新、蕭璠、顏媚英、藍吉富、嚴瑞源、龔鵬程。

目錄

導言 ······	劉石吉
擇地順時——農業的自然環境 ······	陳良佐
溝洫之利——古代農業水利的發展與成就 ······	黃耀能
披荆斬棘——新耕地的開發 ······	梁庚堯
有土有財——土地分配與經營 ······	戴晉新
多能巧思——手工業的發展 ······	陳慈玉
懋遷化居——商人與商業活動 ······	陳國棟

- 城郭市廛——城市的機能、特徵及其轉型 劉石吉 二八五
通貨利商——貨幣與信用 陳國棟 三三三
舟車之利——交通與運輸 張瑞德 四〇一
梯山航海——海外貿易的發展 李東華 四五三
輕徭薄賦——財政與稅務 莊吉發 五五三

導　　言

劉石吉

有關中國經濟史的研究，過去均偏重於專題式的深入探討，少數通史性的論著，也都受制於斷代而論；兩者均很難使我們對於傳統經濟有整體的認識。本書各個主題的編排便是為補救這項缺失而設計，分別從農業環境、水利興建、耕地開發、土地分配、手工業、商人與商業、城市、貨幣、交通運輸、海外貿易、財政稅務等十一個經濟部門，加以貫通性的論述，期能組合成一部明白曉暢的中國經濟發展史。

在中國農業的發展方面，陳良佐先生的「擇地順時——農業的自然環境」指出：早在新石器時代，黃河和長江流域在相距不遠的期間，先後都展開了農作物的栽培工作，成為兩個不同的農業中心；前者以栽培旱地作物的粟為主，後者則以水稻為主。但此後的發展卻是黃河

流域領先長江流域，這種結果與自然環境有密切關係。原先在西元前五千年左右，我國氣候大體是溫暖多雨，當古代氣候由濕熱轉向乾冷時，黃河流域也由北亞熱帶轉變為溫帶，使得適宜濕熱地區發生的疾病，如瘧疾以及其他疾病，因之減少或完全絕跡，這對人口的成長必然相當有利。相反的，長江流域或以南地區仍屬熱帶、亞熱帶，濕熱的氣候使得瘧疾瘴疫流行。換言之，黃河流域的自然環境，對於人的健康，以及人口的成長，都優於長江流域。準此以論，長江流域農業發展緩慢的原因包括：人口的成長緩慢，缺乏健康的勞動力，濕潤、乾硬的酸性土壤使整地困難，缺少廣大平原，同時天然食物的豐富也造成江南人民不去努力改進農業生產技術。而黃河流域農業迅速發展的原因則為：較少的疾病有利於人口的增長，人口的壓力又促使生產方式改進，艱苦的自然環境塑造了勤勞、節儉、刻苦的習性，土質疏鬆、肥沃，氣候的多變化產生了精確的曆法來指導農業生產。以上這些因素使得黃河流域在戰國時代，便已奠定了中國農業精耕細作的基礎；反之，長江流域直到西漢初期仍未脫離原始農業的特徵。

黃河流域的自然環境既無天時與地利，它的農業發展自有待於水利的開發與利用，於是古代的農民，用盡心思與智慧，克服自然環境的限制，開發水利以灌溉經營農業。如此，不但使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凌駕於其他文明古國；農業水利事業發達的結果，也開創出以北

方旱地農業經營爲中心的秦漢統一大帝國，其後更發展出以南方水田農業開發爲重點的隋唐大帝國。水利事業在中國農業經濟開發上，顯然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黃耀能先生的「溝洫之利——古代農業水利的發展與成就」一文便從古代到隋唐帝國的誕生，逐代敍述農業水利事業的發展與成就，藉以了解古代農業水利經營與古代帝國形成之間的密切關係。

中國境內廣大的農業區，並非自古以來即已存在，而是歷史長期演變的結果，梁庚堯先生的「披荆斬棘——新耕地的開發」說明了這個擴展的過程。大體而言，中國農業疆域的擴展有自北而南的趨勢。如前所述，自遠古以至漢末，農業主要在北方發展，南方農業遠比北方落後；漢末以後，由於長期戰亂的破壞，北方農業受到嚴重打擊，開始衰落，農業地理的重心於是逐漸往南方轉移。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唐代以後，南方農業才有了飛躍的發展，並且超越北方，成爲農業地理的重心。唐宋以後，人口持續成長，並且繼續往南方集中，南方土地被充分利用，精耕農業在南方高度發展。到了明清時代，內地耕地已墾闢無遺，過剩的人口往外謀求生活的出路，除了移民南洋之外，便是四向遷往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和廣西，西北的內蒙古和新疆，山海關外的東北，以及東南海上的臺灣等地廣人稀的地區，逐步的開發了邊疆的土地；近代農業疆域擴展的方向，也就由北而南轉而爲向四方發展。在這一個擴展的過程中，農作物的種類越來越繁多，耕作的方法越來越精細，

中華民族生活的範圍越來越廣大；不僅如此，中國人的生活傳統在這個擴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中國文化也伴隨著這個擴展過程而擴展。

土地的開發必然造成土地所有權的問題，戴晉新先生的「有土有財——土地分配與經營」對此有詳細的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制度，戰國以前是公有制時期，戰國時代是從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轉變期，戰國以後，除了北魏太和年間至唐代中葉的二百七、八十年之間曾有一些地區實施過性質特殊的均田制外，大體上皆為私有制。土地私有制的最大特色，就是可以自由買賣土地。在古代，土地又是個人社會地位和一切權力的基礎，一個人有能力購買大量土地，就能擁有勢力。土地既然如此可貴，自然成為人人爭逐的目標，稍有財力者，無不競相把資本投資在土地上，土地兼併的現象於是產生，這是土地私有制的根本問題。秦漢以後，歷代都有學者留心這個問題，並提出各種對策，其措施可分兩類：一類是以法律來限制私人擁有土地的最高面積，手段比較溫和；另一類則傾向於以強制分配、禁止買賣的土地國有制來取代土地私有制，做法比較激烈。前者包括西晉的占田制和歷代的限田措施，後者則包括新莽的王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

陳慈玉小姐的「多能巧思——手工業的發展」，以紡織業為中心，分從絲織、麻織、棉紡織三部份來觀察中國手工業中表現最輝煌的一面。唐代以前，一般農家の織布作業是以自

家消費和貢納爲前提，商品生產性質的織布業在農家尙未發達。唐末以降，商業資本導入農村，促進農村經濟的分解，自給自足的農村社會逐漸崩壞，農村手工業的商品生產特徵也就漸漸明顯。明中葉以後，廣大的佃農階層因爲收入低微，必須將剩餘勞動力投入農耕以外足以補充家計的副業，農家的手工業便因此成爲賦稅與田租的來源，不再是單純的自給生產。

農業、手工業之外，商業的發展也頗有可觀。陳國棟先生的「懋遷化居——商人與商業活動」描述了它的進展。中國的商人起源極早，到了戰國時代，商品流通廣泛，商人甚至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很高的地位。漢初雖行抑商政策，但商人依舊保有他們的聲勢，而且繼續發展，出現了一些大商業。魏晉南北朝時，原本周流天下的商賈，遭遇到戰爭的阻滯，暫時銷聲匿迹，商業也從而蕭條。直到隋唐，政治秩序恢復後，商人再度抬頭，陶磁、茶、鹽等大宗商品脫穎而出，而且南方經過大力開發後，奠定了後日宋代物阜民豐、百業繁盛的基礎。社會上對商人的觀念，在唐、宋之間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商人的社會地位大爲提高，稱爲「行會」的同業組織也發達起來。這種商業發達的現象一直持續綿延，歷久不衰；從明朝嘉靖以來，至清末，山西商人和安徽（新安）商人佔據了我國陸上的商業舞臺。

拙作「城郭市廛——城市的機能、特徵及其轉型」對於中國城市的性質作了簡單的說明。就歷代城市的數量與人口，以及城市的建築規劃來看，中國城市在人類史上佔有特殊顯

著的地位。中國的都市基本上是「城牆都市」，面積遠較歐洲與日本的城堡為大，特別是中古以降的許多主要都城，其規模建置，在人類史上常居首位。歷代的京城人口，在工業革命以前，甚至直到一八五〇年近代倫敦興起以前，也常是當時全世界的最高記錄。城市數量之夥，亦堪媲美西方。城市的內部規劃在整個世界的城市發展史上更具有十分顯著的成功地位。唐宋時代，中國的城市產生了「革命」，那就是商業性城市的興起，一方面行政中心的經濟機能強化，一方面非行政中心的市鎮出現。到了明清時代，市鎮的涵義完全以商業機能為標準，甚至有了專業市鎮的誕生，市鎮人口與數量都越來越多，造成了城市化的現象。傳統中國城市的特質是城鎮一致性，此與西方迥異。中國一直沒有都市優越性的觀念，也一直不輕視農村和鄉土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事實上，傳統中國文化的主要據點應是鄉村，並沒有明顯的城市文化。只有唐宋以後商業城市興起，城市在中國文化的經濟生活中才佔有較顯著的地位；只有近代西化的通商口岸出現後，才改變傳統城市的性質，中國城市才具備西方工業化後城市的特徵。

商業的活動需以錢幣為媒介，陳國棟先生的「通貨利商——貨幣與信用」即在敘述貨幣的發展。先秦是貨幣的創始時代，先有貝幣，後有金屬貨幣。秦漢時代，銅錢成為社會上的主要貨幣。三國以迄隋唐屬於「自然經濟」，是實物貨幣的時代。唐以後銅錢又恢復了主要

貨幣的地位，銅錢的廣泛流通造成長期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宋時，由於交易量大增，紙幣及其他信用工具應運而生。明、清之間，經由菲律賓流入了大量的美洲白銀，是白銀與銅錢並行的時代，但也造成了經濟史上的「物價革命」，以白銀表示的物價大幅度上揚。不過因為貨幣供給的充足，刺激了生產與就業，而有嘉靖——萬曆與乾隆——嘉慶兩段長時期的經濟繁榮。

張瑞德先生的「舟車之利——交通與運輸」分別從道路、館舍與驛遞制度、人工河道、車、船等幾方面探討傳統的交通與運輸。綜合來看，歷代交通建設和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此表現於道路網和運河均以都城為中心向外發展。方式上，水運極為發達，但陸運不發達；沒有水運可供利用的區域，發展的程度通常也都遠較有水運的區域落後，但是中國的水運在傳統末期已發展至最高點，運費無法再降低。技術上，不論是交通工程或交通工具，都有許多省力的發明。胸式馬具、鞍套式馬具、獨輪車、馬燈、船尾舵、縱帆、船閘、運河等都是領先西方的發明。運輸上，速度緩慢且運費高昂限制了長程貿易的發展，這是歷代交通在促進經濟發展上的局限。

中國的對外貿易在唐宋元時代曾發展至足以稱為「海權國」的地步，李東華先生的「梯山航海——海外貿易的發展」對此有詳細的解說。秦漢時代是中國海外貿易的萌芽期，交通